



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 韩方明 主编

相互建构

崛起中的中国  世界

Mutual Construc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
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贾庆国 主编

新华出版社

013059834

D5-53

51

相互建构

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

Mutual Construction: China And The World

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
博士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贾庆国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北航

C1665973

D5-53/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 / 贾庆国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66-0567-7

I. ①相… II. ①贾…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②国际关系—文集

IV. ①D5-53②D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2164 号

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

主 编：贾庆国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张 程 张永杰

封面设计：一术三恒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60mm×240mm

印 张：23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567-7

定 价：43.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主编：

→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台海两岸关系、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的调整。



编委：



← 陈昌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中国外交思想、东亚国际关系



← 吕孝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 李海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张春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副院长助理，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



→ 王梦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韩方明

副主编：贾庆国 柯银斌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义桅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刘 宏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余万里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肖欢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庞中英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贺文萍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赵 磊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赵可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副教授

赵进军 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大使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唐小松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

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友义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

韩方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熊 炜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

总 序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既是中国执政党自我认知的跃升，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力提升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走向自信的标志。“道路、理论、制度”方面的自信，只能在特定的国际大背景下才能得以体现，只有民众对国内外的道路、理论、制度有较客观、全面的认知后才能被认可。

在国际格局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受到的尊重和指责同时增多。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与很多国家的外交活动都迎来“阵痛期”。朝鲜局势、领土争端等国际热点问题不断考验中国的民众理性和外交智慧。其次，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动，国际问题对策影响世界局势和国内稳定。受国际局势变化和突发事件影响而引发国内动乱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为鉴。对决策者来说，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十分迫切，其中，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再次，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史无前例地提高了民众对公共事务、国际事务的参与度，无序快速的内容传播模糊了国家界线、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区别。从此，外交与国际关系不只是政治家、外交官、学者等少数精英参与的“专业学问”，而是呈现明显的“平民化”特征。

所以，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的提升十分迫切。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反日游行中，许多过激行为导致无关人员的个人财产和公共利益受损。“砸车事件”等过激行为爆发有媒体报道、媒体引导、暴力泄愤等诸多复杂的背景，但民众国际问题素养问题引人关注。应当看到，在因国际问题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中，绝大多数人是怀有爱国热情的，非理性的暴力行为主要原因是对国际问题全貌和本质的不了解。当前国内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偏见和非理性关注影响、牵制了国家层面的外交决

策，甚至影响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往往盘根错节，十分复杂。而在关系到本国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上，普通民众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难以理性对待。在这种背景下，尽最大努力提升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显得十分迫切，尽最大可能让民众情绪与国家整体外交方针基本吻合，而不是相反。

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联动效应在满足民众国际问题信息需求方面，媒体的国际报道迈出可贵一步。近两年，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地方电视台，节目中国际问题评论员明显增多。在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交官和国际关系学者走入人们视野，为大家分析国际局势和中国作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民众对国际局势信息的巨大需求，同时是中国加强民众国际素养教育工作的表现之一。

相应地，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普及也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时效性的要求，媒体的国际报道往往注重现象描述而缺乏背景解读，甚至不乏“不实消息”。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长期观察、深入研究所得的研究成果恰好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普及显得十分迫切。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成长起一批优秀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他们精通国际规则、知晓中国国情，很多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很受关注，国内民众却知之甚少。向国内民众普及国际关系知识、提高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和相关机构社会责任之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需要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察哈尔学会是一家非官方、无党派的独立思想库，自2009年10月成立以来，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组建了一支具专业精神、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目前，学会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杂志《公共外交季刊》，邀请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深入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作为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每年主办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还推出了我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教科书——《公共外交概论》（第一、二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公共外交丛书——“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已出版7部专著）。

今后，察哈尔学会将继续秉承“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的理念和原则，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主办、协办一些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传播与实践活动。

此次推出的“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就是这种努力的重要一环，也是继“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后的第二项丛书计划。

察哈尔学会将继续努力，推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者最新成果，同时激励中国社会各界对国际问题展开理性的建设性辩论，不断推陈出新，把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与我们合作，为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察哈尔学会主席

韩方明

2013年6月

前 言

贾庆国

金秋十月，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旨在更好地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培养高层次的创新性专业人才，为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的优秀学子、青年才俊提供一个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察哈尔学会联合主办，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 TCL 集团提供支持。

本届论坛的题目是：“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研讨这样一个题目？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对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讨论还很肤浅，在中国崛起到底是威胁还是机遇的热议中，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不幸被简单化甚至忽略了，这不利于我们客观和深入地认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应该说，崛起中的中国是一个身份和利益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都在出现重要和深远的变化的国家。它既不同于没有崛起的中国，也不同于崛起后的中国。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虚弱、受人欺辱和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力的中国。崛起后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富裕、先进、强大、受人尊敬和在世界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崛起中的中国是在两者之间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中国，它同时具有崛起前和崛起后的国家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崛起中的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双重和矛盾的身份和利益。从身份的角度讲，崛起中的中国既是计划经济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弱

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国家，也是“超级大国”。

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因此，崛起中的中国既有作为计划经济国家的利益（如经济上强调独立自主），也有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如经济上重视比较利益）；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强调发展权），也有作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节能减排）；既有作为穷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主张大幅增加援助金额），也有作为富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强调量力而行）；既有作为弱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排斥国际干涉），也有作为强国的利益；既有作为普通国家的利益（如单纯追求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有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如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是它增加了中国判断和权衡自己国家利益的难度，如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国际干预问题；二是它增加了其他国家判断中国对外政策的难度，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它们很难得出明确的答案；三是它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具有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非常容易出现相互猜疑，关系恶性循环的局面。

除了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以外，崛起中的中国还是一个正在经历根本性变革的中国，其演变总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演变，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变，从穷国向富国演变，从弱国向强国演变，和从普通国家向超级大国演变。它的利益演变的方向也是如此。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变动性和演变趋势给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它不仅要充分考虑过去的身份和利益，也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的身份和利益，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更要着眼于未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不惜牺牲部分发展利益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又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坚决抵制减排压力以维护中国的发展权。表现在国际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利比亚问题上为保护利比亚平民支持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另一方面又为了坚持主权原则在叙利亚问题上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干预的决议案。

部分地由于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与外部世

界的关系也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例如，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是发展中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又是发达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是弱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又是强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是计划经济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时又是市场经济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都感到非常困惑。外部世界很难预料中国的行为，因此时而感到惊喜，时而感到失望。惊喜时期待膨胀，盼望中国承担众多国际责任，失望时防范加强，以应对想象中的中国对外扩张。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判断也因此大起大落，时而感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对世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充满希望；时而觉得国际环境险恶，阴谋论四起，对未来忧心忡忡。

总之，崛起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和未来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复杂、多变，前景莫测。中国和外部世界都需要充分认识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只有这样它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才有可能处变不惊，合理应对，使中国的崛起真正成为一个中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参会博士生们围绕“大国崛起的理论模式与历史经验”、“崛起中的中国：身份认知和利益界定”、“崛起中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与全球治理”、“崛起中的中国与国际形象”等六个议题交换了看法并提交了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时殷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门洪华教授，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义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副教授、王栋副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赵可金副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助理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檀有志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等专家学者对诸位同学的发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点评。通过认真和深入地讨论，大家对上述议题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经过本次论坛学术委员会的匿名评审，清华大学的杨原获一等奖；北京大学的李啟窳和吉林大学的杨晨曦获二等奖；外交学院的席桂桂、北京大学的李侃、余忠剑获三等奖。向他们表示祝贺！“中国学术会议在线”对论坛进行了全程视频转播。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撰写论文的同学、参加评议的老师，向支持和赞助我们这次论坛的北大研究生院、察哈尔学会、TCL 公司、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老师、特别是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先生，向论坛组委会的每一位成员：张春平、陈昌煦、刘璐、孙明霞、吕孝辰、李海涛和王梦影，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	前言 / 贾庆国
1	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 / 杨原
33	结构分析中的一种新理论前提 / 邹琼
48	中国会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革命者吗? / 戚凯
61	国家角色观念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认知演变 / 李啟窺
105	中国崛起进程中自我认知的历史经验 / 李侃
120	生命感、中国关系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 高汝仕
143	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原因探析 / 凌胜利
158	从中吉乌铁路项目看国家利益博弈 / 文龙杰 杜冰瑜
170	试论“弱危机” / 臧励
186	精致的公平? / 席桂桂
206	非合作博弈视角下相对地位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 何睿
229	权力转移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 袁伟华
249	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研究 / 张鹏
267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困境研究 / 杨晨曦
283	寻求博弈均衡之道 / 姜妹
294	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 一项研究议程 / 赵斌
309	对中国形象传播问题的分析 / 余忠剑
321	浅论中国在南海问题中的国际形象 / 葛红亮
335	海外华人对华国家形象认知 / 林逢春 王素娟
348	后记

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

——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

杨 原^①

[内容提要]: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这一变化使得崛起国与霸权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由此前的军事征服和霸权战争转变为通过结盟的形式给小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和追随。在霸权国不断巩固和扩大其盟友阵营,以挤压崛起国潜在盟友数量的情况下,崛起国能否成功崛起并最终赢得国际政治主导权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到追随自己的盟国。作者通过详细分析辽国与北宋争夺高丽以及后金与明朝争夺朝鲜这两个古代东亚的案例,对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究。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都表明,作为目前主流战略思想的利益交换策略,并不足以帮助崛起国争夺到小国。而包括威慑和胁迫在内的强制性策略的适当使用,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这种策略的核心是要让霸权国和小国分别意识到,它们阻挠和拒绝崛起国相关诉求所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它们不这样做时的损失。

[关键词]:崛起战略 权力转移 大国无战争 争夺小国 古代东亚历史

自1945年以来,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国际体系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这种时代的变迁导致了大国之间权力争夺的核心路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②在大国无战争时代,他国大规模军事入侵崛起国的几率固然微乎其微,而崛起国通过发动霸权战争(hegemonic

① 杨原: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② 笔者对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问题的前期探讨见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war) 而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也同样不存在。真正关乎崛起最终成败的,是崛起国能否争取到足够多的追随者从而赢得比霸权国更大的国际领导力和动员力。而在霸权国业已抢占了足够多的“盟友资源”的情况下,崛起国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有可能,那么又该如何做呢?这恐怕是当代崛起战略研究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视并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为当代大国的崛起开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对症的“处方”。笔者不揣浅陋,愿以此文对这个问题做出初步的探讨,以抛砖引玉,供方家批评和超越。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崛起国怎样才能争夺到原本追随霸权国的小国?这个问题涉及“权力转移”这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大国争夺权力的途径是什么。

回顾近现代历史可知,1945年以前,大国间的权力争夺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比如武力兼并弱小国家、武力争夺殖民地、通过霸权战争争夺体系霸权等。而到1945年之后,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主权规范的深化等种种原因,^①领土兼并已不再可能,大国间的霸权战争更是越来越难以想象。^②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以后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已经逐渐由原来的军事征服变成了通过给小国提供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换取小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和追

① 学术界对这些原因的探讨已经非常充分,可参见 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3, 1990, p.740; Robert L. O'Connell, "War: Institution Without Portfolio," in Richard W. Bulliet,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53—258;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Alfred Toivas,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Stable Peace-Making," in Arie M. Kacowicz, et al., eds., *Stable Peace among N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p.150—164;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John Mueller, *The Remnants of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6, No.3, 1991/1992, pp.39—78;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10, pp.31—55。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Rational Theory for a Bygone Era,"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3, 2011, pp.460—468。

随。^①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就是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对方竞争国际主导权。

这种竞争权力的方式与市场中两个寡头企业对市场份额的竞争颇为相似。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两个寡头企业都会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期争取到更多的消费者。这种竞争方式的核心逻辑是“利益交换”，即通过“利他”性的行为以“换取”自己想要的利益。这迥然不同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所强调的“自助”逻辑以及“武力胁迫”这种“掠夺性”的获利逻辑。然而，自1945年之后，这种“利益交换”逻辑却开始在大国权力竞争中逐渐凸显出来。^②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就分别开始为各自阵营的国家主动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以此争夺各自在国际领导权上的“市场份额”。而一旦其中某一方为其阵营中的某个小国提供好处的力度减弱，该小国就会很容易被另一方争取过去，从而使得两个超级大国的“市场份额”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③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地位使得美国拥有巨大的“先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④能够抢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具备竞争能力之前，预先笼络自己的传统盟友，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盟友阵营，以此预防性地压缩潜在竞争者的潜在“市场份额”。在东亚，美国不仅不断加强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还与越南、缅甸等非盟国积极寻求接触。在欧洲，冷战后北约的盟国数量已由原来的16个增加到28个。美国的这种“市场份额压缩战略”使得目前美国的盟友关系越来越紧密，潜在盟友越来越多，而可供中国争取的潜在盟友国家则已所剩无几。

大国的崛起不光需要物质实力的积累，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国家的追随。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物质实力雄厚但

①大卫·莱克的研究表明，二战后的美国正是通过这种利益交换的方式，在其盟国中间建立起了一种具有契约型权威的等级制。参见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A. Lake,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1, 2007, pp.47-79.

②有关这种权力竞争模式的内在机制，可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③典型例子如1973—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后，原本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埃及因得不到苏联的军事援助而最终倒向美国一边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苏联与中国交恶迫使中国与美国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

④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